

《邓小平文选》 大辞典

邢贲思 主编



《邓小平文选》 大辞典

邢贲思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文选》大辞典/邢贲思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2.

ISBN 7-5035-0941-4

I. 邓… II. 邢… III. 邓小平-选集-词典
IV. D2-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5.375

字数: 150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68.00 元

总 顾 问 薄 一 波

顾 问 余 秋 里 陈 丕 显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邢 贲 思

副主编 李 欣 翟文亮 孙洪涛

常务副主编 齐 泰 金 恬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洪君 于险峰 马中文 马志良 马祝恺

王本前 王延中 王佐舟 王 林 王明艳

王树芹 王新生 文 和 巴中山 巨彩丽

吕家毅 乔继宁 华焱平 刘延兵 刘建华

刘杰辉 关宏声 孙玉民 孙慧荣 杨会春

李 凡 李 容 李 艳 吴 彤 冻小林

陈祥林 陈敬绍 范 建 林 乾 周传荣

周 琦 周维煌 张巨河 张 纯 张保军

张南征 张 彬 张 翔 赵一兵 高翠莲

黄如君 黄慧丽 常光民 程广中 谭幼萍

熊志勇 雒树刚 霍国庆

容 幸 刘 分 卷 主 编 幸 荣 主 幸

第一卷	主 编	李 凡	乔继宁
	副主编	张 翔	黄慧丽
第二卷	主 编	周维煌	文 和
	副主编	孙慧荣	吕家毅
第三卷	主 编	雒树刚	常光民
	副主编	范 建	巨彩丽

编撰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洪君	于晓红	才树祥	马中文	马志良
马祝恺	王小平	王云中	王双江	王本前
王庆生	王延中	王佐舟	王 林	王金奎
王明艳	王树芹	王俊霞	王晓华	王晓焰
王维明	王 琦	王朝彬	王新生	王新星
文 和	巴中山	邓小燕	巨彩丽	冯春安
冯凌云	吕家毅	乔继宁	庄建斌	刘占义
刘 伟	刘延兵	刘建华	刘杰辉	刘 勇
刘晓华	关宏声	关 明	阮守应	孙玉民
孙启泰	孙慧荣	孙 康	杜晓勤	杨仲林
杨会春	杨国明	杨洪波	李 凡	李 叶

李生荣	李 英	李洪伟	李洪波	李 容
李 艳	李新民	李慧明	李 灏	宋艳华
冻小林	陈见微	陈玉梅	陈国庆	陈国志
陈祥林	陈敬绍	陈新江	范 建	武力平
武林双	林 乾	季相林	岳东峰	周玉梅
周杨帆	周传荣	周 琦	周维煌	庞桂香
张巨河	张庆云	张 纯	张秀铎	张秀娟
张国雄	张保军	张南征	张 莉	张 彬
张 媛	张 翔	张 薇	赵一兵	赵文莉
赵宝荣	钟 祖	贺力文	贺 强	唐瑞星
高天著	高家方	高翠莲	徐 军	徐学慎
展 敏	秦志仁	翁 辉	郭永和	郭献功
桑 豫	黄大公	黄大海	黄如君	黄 明
黄慧丽	常光民	韩洪洪	彭武汉	景庆宏
程广中	焦 平	曾庆春	曾跃生	蔡永海
谭幼萍	熊志勇	樊敏正	雒树刚	薛晓艺
濮 政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代序)*

龚育之

十四大报告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这个定义,为我们研究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提供了基本的指导。

(一) 敏锐把握时代主题

定义一开头,就讲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时代历史条件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条件要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上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这是我们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线索。

和平为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小平同志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重新估量了国际局势,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

发展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特别是占人类四分之三的不

* 本文曾发表在1993年6月23日《文汇报》,经龚育之同志1993年12月认真修订,改为本书序言。——编者

发达国家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民族的愿望，也把握了中国对人类的責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科学技术革命飞快进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生产力迅速发展。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挑战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强调要把握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但的确成了世界人民努力奋斗以求解决并可能解决的时代主题。和平有利于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对和平与发展的新认识联系于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小平同志不是反复地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页），“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4页）吗？

（二）理论的起点在哪里？

定义接着讲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

可不可以把起点更向前推？我想，应该明确肯定，起点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不要模糊这个起点，这个标志。当然，“起”，也不是突如其来。这个理论诞生的酝酿，我看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五年。这一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全面整顿。整顿，虽然没有也不能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错了，但又的确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所以，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来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来了一个“两个凡是”。婴儿诞生会引起

阵痛。批邓反右、“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路线和理论诞生前的两轮阵痛吧。

小平同志后来说过，那时的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还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五年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用的名称是整顿，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

因此，我认为，从起点往前追溯，把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当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诞生前的酝酿，是合理的。最先出版的那一卷《邓小平文选》，从一九七五年选起，正是反映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三）同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三重关系

那么，能不能进一步再往前追溯呢？有的文章，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八大小平同志当总书记那个时候；还有文章，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作更多分析。我认为，那已经不属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也不属于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问题，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

无疑，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了我们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和贡献。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更是如此。小平同志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特别是八大他当总书记以后，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和贡献中自然有他的一份功劳。小平同志还说过，八大以后中国挂领导人的像，有他的一个，“文化大革命”以前党中央的失误，也有他的一份责任。

我们曾经指出：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一九

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一九六〇年冬天以后五年经济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小平同志后来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互相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

这就是说，那十年中无论是正确的发展趋向，还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要讲主要代表，总的说都得由毛泽东来代表。正确的发展趋向中积累起来的東西，大都是毛泽东提出的或者是别的领导人提出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它们属于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错误的发展趋向积累起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那属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来分析呢？

我一直认为，后者不是前者的单纯延伸，两者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一是纠正，二是继承，三是开拓和创造。

纠正“文化大革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的契机。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地考虑走一条新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有很大的“功劳”。也就是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条件是要正视它的教训，总结它的教训。所以，纠正和总结“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研究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线索。

继承过去的探索在实践和理论上积累的一切正确的东西，体现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连续性。应该看到，纠正错误是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决不是全盘否定历史。如果全盘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就会丧失基本的

立足点。还应该看到，过去积累的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就是回到过去的正确的东西。所以，对过去的正确的东西的继承，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线索。

当然，在研究这种继承的时候，又必须看到过去的正确的东西在广度、深度、确定程度、完备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不能等量齐观。

十四大报告所下的定义，讲到了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所凭借的历史经验——“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这句话的前半句，说的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关系。这里包括胜利和挫折两个方面，并把它摆在新的实践过程和新的理论起点以前，摆在历史经验的位置上。

十三大报告讲两次历史性飞跃，说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国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次飞跃的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能说是在一九五六年或者一九四九年。

既然说是飞跃，那就不单是纠正和继承，而且有全新的开拓和创造。纠正和继承，开拓和创造，又是密切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

在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有新的开拓和创造，这是我们在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又一个线索。

（四）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

开始产生、形成主题

阶段划分的问题，前面讲了起点。起点之前，算酝酿阶段。起点之后，经历了哪些阶段？

我认为，从历史进程本身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历史的新时

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新阶段，因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应该看作新时期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相应地，反映这个历史进程的理論的形成和发展，也应该以这十四年作为第一个历史阶段。

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中，还可以再分为若干小的段落。我认为，有三个小的段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从十三大到十四大。经历了这些小的段落，这个理論产生，形成，走向成熟。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进行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就是批评“两个凡是”，讨论真理标准，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切拨乱反正的先导。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十二大。可以说，这四年的主要历史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当然改革开放也已迈开重要步伐。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这个理論开始产生，到十二大形成和提出了一个集中的口号，即后来成为这个理論的名称和主题的口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先出版的那一卷《邓小平文选》，文章收到十二大以前，正好是酝酿阶段和这个理論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开始产生、形成主题的这段时间的著作。

（五）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

十二大以后的主要历史内容是全面改革。这里说的改革，包括开放在内。小平同志说过：开放政策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叫改革。小平同志也说过：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他总是把改革开放统一起来理解。

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要求思想解放的深入，要求理论思考的深入。

小平同志十二大以后的著作，已经结集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第三卷出版前，先后出版过两本小册子，第一本小册子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书名，这不是偶然的，它正好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展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小平同志反复阐述的中心论题就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要求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社会主义要在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上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索，促使我们党重新构建关于社会主义任务和目标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得到确认和展开论述的。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评价甚高，在通过这个决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即席讲话，称赞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接着在中顾委讲话，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91页）他注重的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在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已经提出，作为一个理论来展开论述，用以贯通和解释我们的

经济发展战略、各方面体制改革、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则是十三大的事情。十三大报告就是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是经过小平同志同意的。他批了“这个设计好”五个字。大会前，他向外宾介绍：我们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大会后，他又向外宾介绍：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8页）

如果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建设经济特区，是改革起步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入在理论上的两大突破。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领导、提倡、支持下打开局面和取得成果的。

十三大报告明确地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鲜明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在六十多年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并列举了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因此，我们说，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个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

（六）以南方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一九九二年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一，是因为这个理论经受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的严峻考验。从十三大到十四大这五年，国内国际都发生了重大事变。这些事变的严重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未曾面临过的，它们的发生也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正是这种严峻考验，使越来越多的人

们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巨大的风波和变局中闯过关来，站住脚跟，并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理论作指导，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和威力，人们增强了坚持这个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二，是因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把这个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南方谈话是在总结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我们面临的时机和挑战的基础上作出来的，不仅有政治上的鲜明性和针对性，而且有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创造性。南方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以来围绕改革开放姓“资”姓“社”，解放思想和加快发展，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问题，所展开的思考和探讨，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深刻透彻的概括和阐发。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新概括，关于台阶式发展战略的新概括，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等等，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新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九八九年五月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篇谈话中，小平同志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南方谈话正是这样的新思想。南方谈话是代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三，是因为以南方谈话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根据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历次论述的精神，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

立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里面的“第一次”，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创造性，“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说的是这个理论的成熟性，“初步”则是说的成熟程度，说的走向成熟。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四，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即这个理论实践的时间还不长，我们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能还要二三十年时间，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这个理论还有待充实、完善和发展。但是我们相信，在由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辟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将接受新的检验，得到新的发展，指导我们党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 和小平同志的历次论述

这里，我想专门谈谈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和发展。

去年，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介绍小平同志六次有关论述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和发展。现在我想作一些补充，并从更广的历史背景来作一些探讨。

先讲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商品、市场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我国是一步一步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的。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没有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作关于《共同纲领》起草的说明，则明确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三年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其绪言中说：恢复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起来，“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开辟了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于是计划经济开始支配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

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计划经济起过重要作用。面对全盘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曾多次设想要有所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改革设想，是八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计划生产是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的思想。这是公开发表，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条改革思想，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人们不大知道。我指的是前些年我们写文章介绍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关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的谈话。意思是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可以允许资本家投资雇工办厂，这自然属于按市场变化自由生产的经济。前一个设想郑重地写进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后一个设想则只是思想的火花，并没有形成决策。

历史的曲折就在于，无论是前一个设想，还是后一个设想，都由于后来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而被搁置，被抛开了。人民公社化中还刮起一股消灭商品的“共产风”。毛泽东最早觉察和批评了这种主张，并就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的问题说了一些重要意见。这就是近来人们常引的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值得珍视的思想，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过去积累的正确的东西”之列。当然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的思想没有能贯彻到底，而且包含着许多矛盾。后来在实际政策中对商品生产仍然诸多限制（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就是割自由商品生产和自由市场的尾巴），在理论上则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

总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尽管也有复杂情况和起伏过程，从根本上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遵循的是一条追求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的道路。